

埃及问题研究

理解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
着眼点辨析

陈天社

内容提要 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当代埃及对外关系，地缘、利益、冷战和领导者是 4 个基本着眼点。地缘是埃及对外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大国、欧洲和非洲是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维护国家利益是埃及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在不同阶段，埃及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冷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埃及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影响到埃及对外关系的诸多方面，决定了美国 and 苏联是本时期埃及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埃及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领导者在外交决策方面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埃及对外关系打上了鲜明的领导者个人烙印。

关键词 埃及 对外关系 地缘 利益 冷战 领导者

作者简介 陈天社，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郑州 450001）。

地缘：埃及对外关系的基础

埃及国土面积约 100.2 万平方公里¹，地跨亚非两大洲，北濒地中海，南邻苏丹，东临红海与沙特阿拉伯相望，西接利比亚。在亚洲，埃及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接壤。苏伊士运河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水上要道。这一地理位置，对埃及意义重大。埃及著名人士海卡尔（Mohammed Hasanein Heykal）曾指出：“埃及的位置决定着埃及必然要对历史起作用。如果埃及强大起来，它就能担负起与其位置相应的责任；如果它衰弱下去，它只能成为控制这一位置的外国帝国的一部分。如果埃及没有能力利用这个位置，那么别人将要来利用。总之，这个位置不会空着，历史也不会让它空着。”^④

1. 阿拉伯世界 从地理上看，埃及是连接阿拉伯东方和阿拉伯西方的纽带，这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阿拉伯世界也成为埃及的重要关注点。纳赛尔强调，埃及永恒不变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着它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是担当阿拉伯统一任务的英雄和领导角色。^④由此，纳赛尔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十月战争前，萨达特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为

¹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2 年），第 11 页。
^④ [埃及] 穆·哈·海卡尔著：关桐等译：《愤怒的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9 页。
^④ 参见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 页。

收复阿拉伯失地而努力。但十月战争后,萨达特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埃及因此被孤立于阿拉伯大家庭之外。海卡尔对此有精辟分析:“……由于埃及脱离阿拉伯大家庭,在地区有限的政治地理范围中的活动僵化了,丧失了未来的理想,发现自己陷入边界争论、教派战争和社会动乱的矛盾中,导致出现一种类似巴尔干的局势。”¹ 穆巴拉克执政后,充分认识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大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最终回到阿拉伯大家庭中来。

在埃阿关系中,埃及特别关注苏丹、巴勒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苏丹与埃及有深厚的历史联系,一直被埃及视为其战略后方,且居于尼罗河上游,事关埃及的水安全。巴勒斯坦事关埃及东翼安全,又是阿以冲突的核心与关键,是埃及发挥地区作用的重要舞台。由于沙特阿拉伯独特的宗教地位和雄厚的石油美元,埃及既希望在中东事务中得到沙特的支持,渴望得到其更多的经济援助,又竭力避免同沙特在地区作用方面的竞争。

2. 以色列 以色列是埃及东部强邻,是影响埃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历届埃及政府均把以色列作为重要防范对象,十分关注以色列的动向。即使在两国实现和平后,埃及仍然保持对以色列的戒备心理,不乐意和以色列发展关系。特别是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唯一国家,令埃及非常不安。曾任埃及外交部长的穆萨(现阿拉伯联盟秘书长)指出:“只要以色列还继续拥有威胁其邻居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融入本地区就是不可想象的。”^④ 当然,以色列也未完全信任埃及,这是埃以“冷和平”状态形成与延续的重要因素。

3. 国际上的大国 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是当代埃及对外关系的难题之一。正如有学者分析:“在埃及有关的各种国际关系中,从地区内部来说,阿以关系是牵动全局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同英美苏三大国的关系是较为重要的。英美苏这三大国的插手中东,是使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与埃及相关的诸种国际关系中,它们与埃及的关系占有更加主要的地位。埃及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埃及对外关系中尤其显得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对外关系的全局。”^④ 埃及不得不在这些大国的争斗中小心地寻找自己的回旋之地。如在纳赛尔时期,尽管埃及和苏联关系密切,但也长时间和美国保持某种关系。在穆巴拉克时期,尽管和美国的关系发展顺利,但也和苏联(俄罗斯)发展关系,以谋求二者的某种平衡。

4. 欧洲与非洲 埃及与欧洲在地理上相近,历史上就有密切的交往。在近代,埃及深受欧洲的影响,也曾被欧洲列强侵略和控制,最终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和保护国。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国、法国对埃及的影响变得微不足道。十月战争后,埃及与欧洲关系,特别是与欧共体的关系出现实质性变化。21世纪以来,埃欧关系发展迅速。2004年5月,埃及与欧洲签署了伙伴关系协定。埃及与欧盟国家领导人互访非常频繁。到2006年底,穆巴拉克总统一共出访法国46次,出访德国24次,出访意大利18次。^¼ 同时期,也有大量欧盟国家领导人访问埃及。近年来,欧盟已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以2005年为例,埃及从法国的进口额为14.18亿欧元,德国为13.5亿欧元,意大利则是埃及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进出口总额达26亿欧元,仅次于美国。^½ 欧盟还是埃及重要的外援提供国。2004~2005年度,欧盟向埃及提供了5.22亿美元的无偿援助。^¾

非洲是埃及对外关系的传统领域。纳赛尔提出的“三圈理论”,其中之一就是非洲圈。纳赛尔时期,埃及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埃非关系密切。萨达特单独与以色列和解后,遭到大多数非洲国家反对,埃非关系转入冷淡。穆巴拉克时期,埃非关系得到改善,并顺利发展。穆巴拉克主张在

¹ [埃及]穆·哈·海卡尔著;关桐等译:前引书,第371页。

^④ Ephraim Dowek, *Israeli-Egyptian Relations 1980-2000*,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2001, p. 267.

^④ 陈建民主编:前引书,第34页。

^¼ 参见王锁芳:《埃及的独特地位及其在中非合作中的有效作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86页。

^½ 同上文。

^¾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5年),第133页。

非洲建立无核区，积极调解非洲国家间的冲突，两度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主席。1998年5月，埃及加入了东南非国家共同市场。埃及还和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

利益：埃及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国家利益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三方面。¹ 埃及的对外关系也不例外，其出发点和宗旨就是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

但在不同阶段，由于埃及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导致其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差别，进而影响到埃及对外关系的走向。纳赛尔执政初期，实现和巩固民族独立是埃及的首要任务，而最紧迫的难题是如何获得保卫新生政权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在向西方国家求援未果后，埃及被迫向苏联求援。而苏联的慷慨援助，使埃及几乎全面依赖苏联，埃苏关系迅速发展。十月战争后，埃及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全部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拯救濒于破产的经济。美国对以色列的独特影响力及巨额外援，使其成为埃及选择依赖的对象，埃美关系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埃以关系也随之缓和，而苏联因为不具有美国这样的作用而被排除在外，埃苏关系每况愈下，最终破裂。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言：“俄国人只能为你们（埃及）提供武器，而我们能为你们提供和平。”^④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与提高埃及的地区作用，以期回归阿拉伯大家庭。为此，埃及采取了冷却埃以关系的策略，逐步取得阿拉伯国家的认可，埃及与阿拉伯关系也逐步缓和，最后与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1989年5月，埃及也重新回归阿拉伯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依旧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深度卷入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重大问题，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及对埃及的巨额援助，使埃及非常重视与美国的联系，埃美关系继续向纵深发展。

虽然埃及把与大国关系放在埃及对外战略的中心位置，但埃及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大国，而是致力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埃苏关系中，虽然苏联为埃及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纳赛尔依然迟迟不允准苏联迫切需要的军事基地。当苏联的“不战不和”战略影响到埃及对以色列的战争准备时，萨达特毅然将苏联军事专家驱逐回国。在穆巴拉克时期，美国虽是埃及的盟友，一直为埃及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埃及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批评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埃及都激烈抨击美国。如对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在中东民主和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埃美摩擦不断。据美国国会的统计，埃及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80%都不站在美国一边。^④

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除了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之外，埃及还有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使命。阿以冲突是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埃及曾是阿以冲突中阿拉伯阵营的主力军，一直致力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巴以和谈中巴勒斯坦方面的后盾，也对以色列保持着一定压力。在阿拉伯民族遇到挑战时，埃及积极协调各方立场，为阿拉伯民族团结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埃及的立场是阿拉伯世界的风向标。但是，埃及的本国利益也经常与阿拉伯民族利益不一致。在这两种利益不一致时，埃及是以牺牲阿拉伯民族利益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如为收复西奈半岛，埃及违背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和解、不谈判），走上了与以色列的单独和平之路。这严重损害了阿拉伯民族利益，是埃以和解后阿拉伯国家孤立埃及的根本原因。另外，埃及过多地背负阿拉伯责任和义务，也为自身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如埃及卷入阿以冲突，给埃及带来严重的人力、经济与军事损失。埃及仅在四次阿以战争中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000亿美元^{1/4}。纳赛尔热衷于支持阿拉伯革命，特

¹ 参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年鉴》（2005年），第55~56页。

^④ [埃及]穆罕默德·哈·海卡尔；星灿译：《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④ 参见吴宝国、陈冬云、王岚：《埃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1/4} 王京烈：《埃及外交政策分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第32页。

别是卷入也门内战，也使埃及得不偿失。但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非常注意本国利益与阿拉伯民族利益的平衡。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还没有承认以色列时，埃及一方面坚持与以色列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又把埃以关系置于非常低的水平。

当然，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面临本国利益与阿拉伯民族利益的平衡问题。这两种利益的交织，也影响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就是个典型例子。两国为维护阿拉伯民族合法权益而共同斗争。埃及在前线与以色列厮杀，沙特则为埃及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特别是在十月战争时，两国的团结与合作堪称典范。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埃及积极在阿以间斡旋，沙特也于1981年、2002年两度提出和平方案。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时，两国又共同致力于科威特的解放。但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不同，两国也时常发生冲突。最著名的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由于对以色列和解的立场不同，两国曾断交。另外，两国都有争当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盟主的愿望，这也使两国心存芥蒂。如对海湾战争后的海湾地区安全安排，为避免埃及插手海湾事务，沙特拒绝了以埃及军队作为安全力量的要求，而是依靠西方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各阿拉伯国家本国利益与阿拉伯民族利益的不平衡，严重影响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正如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要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益服从其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能领导民族走向统一的要害。”¹

冷战：埃及对外关系的国际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埃及也不例外，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的焦点。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企图把埃及纳入美国旨在遏制苏联的中东防御计划，但遭到埃及的拒绝。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没有支持其战略盟友，反而对其施加巨大压力，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趁虚而进入中东。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应当提出最好的思想为我们可能解决的问题而工作，特别是要把埃及、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从苏联支配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由于英国和法国已在中东没有影响，为拯救这些国家并使其转向西方，我们一定要成为领导者。”^④但美国并没有采取多少对埃及的实际援助措施，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埃及也成为苏联在中东的柱石，而埃及与美国的关系却渐行渐远，乃至1967年断绝外交关系。虽然“六五”战争后埃苏关系发展很快，但美国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使埃及逐渐对苏联失去信心，而愈发倾向于美国。于是，纳赛尔在其晚年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萨达特上任后，极力改善埃及与美国关系。而美国提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埃及远离苏联。虽然埃及靠苏联提供的武器发动了十月战争并在其初期取得胜利，但萨达特对苏联的信心丧失，导致埃苏关系不断恶化，并最终破裂，而埃及走上了全面依靠美国的道路。美、苏在埃及的较量最终以美国胜利而告终，埃及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盟友。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在与美国的对峙中已处于下风。在这一背景下，虽然1984年埃及与苏联复交，但两国关系的水平已是今非昔比，而埃美关系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衰微，已无实力与美国竞争。与这一趋势相符，埃美关系不断发展，而埃俄关系在两国的对外战略中已不占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制于冷战，埃及对外关系中处处都有美苏对抗的影子。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和苏联就比较活跃。在也门内战中，共和派和保皇派势不两立，这两派分别得到埃及和沙特的支持，而埃及、沙特则分别得到苏联和美国的支持。1967年“六五”战争和1973年十月战争，表面上是阿以之间的对抗，其实背后是美苏在较量。埃及的背后是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身

¹ 杨灞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④ Geoffrey Wa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uez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 No 2 1991, p. 316.

后站着美国。十月战争也成了“苏式武器与美式武器的大较量”。在这两场战争中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方面的失败，表明美国在与苏联在中东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十月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竭力在埃及之间斡旋，也有防止苏联插手的一面。如美国为避免埃军第三集团军被歼，向以色列施加了强大压力，称“如果以色列不解除对该军团的围困，就存在苏联出兵中东的借口。不管怎么样，以色列必须立即开放向第三集团军供应的通道”¹。十月战争后，埃及向美国提出帮助清理苏伊士运河，也引起苏联的不满。1974年5月24日，莫斯科阿拉伯语广播电台广播说：“一些美国人员正在试图以运河非军事化为借口向埃及施压，对苏联船只在运河自由航行予以限制。”^④同样，埃及和平进程也避免不了美苏的较量。里根时期曾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戴斯明确指出，戴维营和平进程与反对苏联在中东的威胁这两方面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④。

综上所述，虽然埃及一直奉行中立与不结盟政策，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埃及实际上并没有多大选择余地，只能选择一方作为依靠。正如学者杰弗瑞·A·列弗卜弗（Jeffrey A. Lefebvre）所言：“在5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政治的零和游戏中，华盛顿认为埃及的不结盟政策削弱了西方在（中东）关键战略地区的力量，视埃及为背叛者。而相反，由于巴格达条约包括英国和与埃及敌对的伊拉克政府，埃及将它们视反对埃及的联盟。基于对支持建立以色列军事优势的西方阵营的拒绝，埃及转向东方阵营寻求武器。”^{1/4}埃美、埃苏关系的演变，也一直无法离开对方的影响。正如萨达特所言：“那时候（纳赛尔时期），埃及政策中的每个变化总是触犯美国的立场，因为当时美国立场的出发点就是硬要使埃及同西方世界之间旧的状况继续下去。因此，埃及政策中的这种变化总是造成埃及和美国之间的相互疏远；与此同时，其结局却总是使它同苏联之间更加接近并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交往，以至有人说埃及已经成了苏联能够存于中东的门户。”^{1/2}

领导者：埃及对外关系的个性色彩

埃及是总统共和制国家，总统一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外交决策上，总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有学者称外交决策是埃及总统及其近臣的专有领地。^{3/4}总统在埃及政治中国王般的权力和在外交决策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埃及对外关系显著地打上了总统的个人烙印。

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深恶痛绝，埃及广泛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纳赛尔亲身参加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蒙受了阿拉伯战败的耻辱，这使埃及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全力卷入阿以冲突。纳赛尔对阿拉伯民族的责任感，使他热心于阿拉伯统一事业，推动了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还极力在阿拉伯世界扩大埃及的影响，支持阿拉伯革命，以至多个阿拉伯国家效仿埃及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革命。一时间，埃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源泉。

萨达特时期，萨达特本人对苏联的厌恶与极度不信任，使他对与苏联发展关系失去信心，埃苏关系不断恶化。曾任埃及外交部长的伊斯梅尔·法赫米（Isma'il Fahmy）曾评论说，萨达特“从来没有了解、喜欢或信任过苏联人，而苏联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⑤。而萨达特对美国领导人有好感，

¹ 张士智、赵慧杰主编：《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④ Mohrez Mahmoud elHussini *Soviet-Egyptian Relations, 1945-198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 205.

^④ 参见陈建民主编：前引书，第98页。

^{1/4} Jeffrey A. Lefebv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gypt: Confron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Northeast Africa 1956-6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9 No. 2 1993 p. 325.

^{1/2}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著；钟艾译：《萨达特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6页。

^{3/4} 参见王京烈：前引文，第32页。

^⑤ Isma'il Fahmy, *Negotiation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Croom Helm, 1983 p. 11.

特别是他对美国总统卡特满怀信任,将卡特作为埃及人民可信赖的朋友。由此,他全力接受卡特在埃以和谈中的斡旋。这不仅促使埃以关系有重大突破,也极大地推动了埃美关系的发展。

萨达特喜欢独断专行,重大决定经常由他自己一人做出。有人这样描述他的重大决策过程:“当面临重大问题时,他回到总统住所住上几天。他不喜欢读备忘录和报告,喜欢使他的助手惊讶。萨达特的顾问私下称他为法老。”^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描述说,萨达特喜欢一个人思考问题,他经常不同部长们交换意见,很多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他一个人在午饭后沿尼罗河散步时做出的。^④

萨达特常常做出出乎人们意外之外的决定,他称之为“闪电震惊战略”^④。1971年,他未同任何人商量就决定埃及加入与利比亚、叙利亚的联邦。只有两个人知道他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而且是在告知苏联大使前几小时。发动十月战争的时间,是他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Hafez Assad)协商后决定的,仅告知了他的高级官员。访问耶路撒冷,同样是萨达特的个人决定。他在人民议会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只有副总理图哈米(Hasan Tuhami)一人知道。萨达特的性格特点及在外交决策上的地位,为埃及对外关系,特别是为埃以关系的重大突破起了巨大作用。曾任以色列驻埃及大使的都威克(Ephraim Dwek)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无疑,他是和平的主要缔造者。没有他的远见卓识、果敢,没有他准备以其个人和民族的冒险,没有他对短期、长期历史进程的评估能力,在我们这一代与埃及实现和平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⑤

穆巴拉克同样掌握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他任总统后,负责制定有关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和处理有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少召开会议,他更喜欢向身边的近臣和幕僚进行咨询。穆巴拉克长期服务于军界,这使他养成了果敢、服从命令的性格。在萨达特遇刺后埃以和平面临何去何从时,他毅然选择继续和平进程。但他对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什么好感。他不喜欢以色列总理沙米尔,视其为“不妥协和教条的”,是“和平的敌人和埃及在本地区目标的障碍”。^⑥因此,他一直拒绝在任何地方与沙米尔会晤。此后,他又强烈抨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沙龙,不信任他们,尽可能少地与他们接触。如2001年沙龙上台后,穆巴拉克长时间不邀请沙龙访问埃及。即使在埃以关系缓和的拉宾政府和巴拉克政府时期,埃及也没少批评以色列领导人。他一直拒绝访问以色列(唯一的一次到访以色列是参加拉宾的葬礼)。这样,埃以关系长期处于冷和平状态。

可见,由于埃及的总统制及独特决策机制,使埃及对外关系深深地打上了领导者的个人烙印,领导者的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对外关系发展。但必须指出,虽有领导者的个人好恶,但决定埃及对外关系根本点的还是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地缘、利益、冷战及领导者是考察埃及对外关系的四个基本着眼点。地缘是埃及对外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大国、欧洲和非洲是埃及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维护国家利益是埃及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在不同阶段,埃及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埃及对外关系还面临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重要使命。冷战影响到埃及对外关系的诸多方面,决定了美国和苏联是20世纪90年代前埃及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埃及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领导者在外交决策方面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使埃及对外关系打上了鲜明的领导者个人烙印。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Ibrahim A. Karawan “Sadat and the Egyptian—Israeli Pea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6 No 2 1994, p 257.

^④ 参见理查德·尼克松著:尤懿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④ See Ibrahim A. Karawan op. cit p. 256

^⑤ Ephraim Dwek, op. cit p. 282.

^⑥ Ibid., p. 290.

Towards a New Decade: A Stud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FOCAC

Li Weijun, Zhang Zhongxiang, Zhang Chun & Zhu Ming

pp. 5– 10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is a successful creation for China and Africa to seek for a new cooperation model. Within a decade since founded,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develop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CA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been fruitful and making progress continuously. FOCAC will b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profound adjustment has been brew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are presenting complicated and multiple situations. FOCAC has still much to do in how to serv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integrating necessary resources, playing an effective role and improving its own mechanism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Elements of Egyptian Foreign Relations

Chen Tianshe

pp. 11– 16

To understand and perceiv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modern Egypt, the four factors of geography, interests, the Cold War and the leaders can be essential. Geography is the basis of Egyptian foreign relations and it sets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s of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Arabian world, Israel, great powers, Europe and Africa. The aim of Egyptian diplomacy is to serv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but the

emphasis is som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hases. The Cold War before 1990s had influenced many aspects of Egyptian foreign relations and dec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were the top priority in it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the Egyptian leader had supreme power in deciding diplomacy which personalized the Egyptian foreign relations.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in South Afric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Yang Lihua

pp. 29– 36

South Africa is a middle 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 Since 1994 when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ethnic equality founded, it has reformed it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bolished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law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ly unifi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and security system. The proportion in GDP of the governmental social assistance finance of South Africa can be near to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s in the top ones of the developing, which has covered one-fourth of its total population and been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relieving poverty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weak and poo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the phenomena that some people are absolutely relying on social assistance. So the government is carrying out policies of developing economy and enlarging employment, increasing the laborer's income, reforming the relative system and raising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of the people.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could be borrowed b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olv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ality.